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论文,证实三星堆7号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这为研究中国古代用铁史增添了关键新材料。

7号坑出土“来自上天的馈赠”

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



▲三星堆7号坑发现的陨铁制品。受访者供图

据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2021年,考古队员在三星堆7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壁南侧发现一个垂直立于坑底的形似长条状的工具或兵器,器身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看上去像长条形的斧钺类器物,但锈蚀严重,器形已难分辨。考虑到器物保存较差,发掘团队将器物连同周边土体整体切割,转运至实验室进行后续保护和研究。

经过实验室分析,研究团队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同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铁器的应用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重大变革,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制品,但也体现着我国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黎海超说。

所谓陨铁,也叫铁陨石,是陨石的一种主要类型。它是来自外太空、坠落在地球上的天然铁镍合金,多来自小行星或行星核的碎片。在人类掌握冶炼铁矿技术之前,陨铁是古人能获得的唯一一种天然金属铁,因此常被赋予宗教、权力或礼仪上的特殊意义。这说明在3000多年之前,古蜀人也许偶然得到这块来自天上的“馈赠”,将其视作珍贵的材料,并

通过加工制成了某类器物。

此次三星堆遗址7号坑出土的陨铁,把中国古代使用陨铁的地理范围,从黄河流域进一步延伸到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填补了西南地区早期用铁史的空白。

据了解,截至目前,7号坑已经出土的编号文物为4378件(组),其中相对完整的器物1686件(组),基本都出土于器物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法国正式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

据新华社巴黎5月10日电(记者 张百慧)根据法国政府10日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日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

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

徐悲鸿如何

『为人民造像』

阿来、徐骥对谈『那些温暖的、普通的动人瞬间』



对谈活动现场。刘建伟 摄

2026年是艺术巨匠徐悲鸿诞辰130周年。5月10日下午,一场以“那些温暖的、普通的动人瞬间”为主题的深度对谈在位于成都的阿来书房举行。这场对话围绕四川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新书《为人民造像:徐悲鸿笔下的劳动人民》展开,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本书编著者徐骥,与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一起,共同回溯一代大师如何用画笔为时代留影,为平凡人立传。

《为人民造像》系统梳理了徐悲鸿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创作历程,不仅收录了《巴人汲水图》《九州无事乐耕耘》《愚公移山》等宏幅巨制,也挖掘了《洗衣》《渔夫》《背柴》等较少曝光于大众视野的作品,以及1950年徐悲鸿为全国劳模大会创作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肖像。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部纸上的“精神底片”。

破“奔马”之困 重塑一个更全面的徐悲鸿

许多人认识徐悲鸿,都是从他的奔马图开始。对谈伊始,徐骥却坦言了这种符号化认知带来的“困惑”:“大家可能都是通过马知道徐悲鸿的。观众来展览馆问得最多的也是‘马去哪儿了’。但徐悲鸿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的,他的油画、素描、粉画、水彩、书法都很全面,笔下除了马,还有狮子、老虎、猫、猪,从

家禽到猛兽等几十种。”

为了打破这一刻板印象,才有了《为人民造像》一书的缘起。徐骥希望能让公众看到,徐悲鸿不仅擅长画动物,更在历史题材之外,将深情的注视投向了身边的普通人。他将画劳动者视为一种源自内心的选题,也是一种对中国画的大胆实验——当传统文人画在程式化中走向瓶颈时,徐悲鸿选择将人物、将劳动人民作为创作主体,同时汲取西方绘画的一些优点进来,以此努力推动中国画的革新。

寻“造像”之根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徐悲鸿主动邀请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走进中央美术学院,为他们现场写生造像,把他们的形象定格在作品之中。那一幕,还被镜头捕捉下来。

徐悲鸿为何能将普通劳动者刻画得如此动人?徐骥认为,这与他的出身经历密不可分。徐悲鸿的家乡在江苏宜兴的岷亭桥镇,当时那里是穷苦之地,常遭水灾。他儿时还要帮父亲种瓜田,农闲时还要替别人放牛。正因如此,他日后所画的牧童与牛、村歌等田园题材里,总有一个孩童的身影,那正是徐悲鸿自

己儿时的印记。

正是这份来自生活的积淀,让徐悲鸿对普通人的境遇有着天然的共鸣。徐骥还特别提到,四川在徐悲鸿的艺术生涯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当年徐悲鸿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办了个人最大规模的展览,展出作品多达两百余件,包括《六骏图》等重要代表作,几乎都是在四川创作完成的。巴山蜀水的人文环境与战时后方的生活气息,给予了徐悲鸿丰厚的滋养与平和而坚定的力量。

融“技法”之道

将科学精神融入艺术创作

在绘画技法上,徐悲鸿是“中西融合”的积极践行者。他以“致广大而尽精微”为核心理念,许多传世名作在画成之前,必有大大小小数张油画或素描小稿。过去,人们的目光常聚焦于最终的宏大作品,但随着一点点的梳理与发掘,才发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稿里,深藏着极为动人的艺术价值和人物故事。

徐骥在现场分享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徐悲鸿曾为一名海军战士画像,多年后大家才发现,这位战士正是经典电视剧《父母爱情》中人物的原型之一。徐骥由此感慨,随着后人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被画家真诚记录下的面孔连同他们背后的故事,都会穿越时光被重新发现。

作为作家的阿来,则从另一个维度对徐悲鸿的创作进行了深刻解读。他首先称赞《为人民造像》是一本好书,认为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创作者与其所处时代发生精神共振的产物。

阿来指出,徐悲鸿这一代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为中国艺术引入了科学的观察方法。他分析道:“过去中国的文人画多为象征,缺少严格的写生。写生功夫其实就是用科学的眼光观察对象,然后把它描述下来。过去我们没有做这件事

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这100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才有了。”在阿来看来,这不仅是技法的更新,更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科学不光是有人在发明什么东西,科学对于文学艺术来讲,是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来打量世界。这其实就是科学进入人文、科学进入艺术。”正是这种碰撞与融合,为陷入程式化瓶颈危机的传统绘画艺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对于这种“精微”的追求,阿来也有深刻的共鸣。他提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同样如此,作品中涉及的植物、动物等物质世界,必须做到科学上的绝对真实,而在此基础上,再用想象力和共情力去描绘他人的生活。“如果有一点偏差,那就丢失了基本的真实与天赋。”

传“原创”之力

穿越时光的情感与气息

在图像泛滥、信息爆炸的今天,“为人民造像”的精神还有多少分量?阿来认为,经典之所以流传,首先在于它有坚实的精神内核。他以杜甫写马的诗与徐悲鸿画的马相比,指出其内在的精气神是相通的。他反思当下,太多人将眼光投向了短期的“消费泡沫”,“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变质,而泡沫破灭后,只剩一片空虚。”

谈及AI对艺术的冲击,徐骥的观点非常坚定:恰恰因为AI的到来,才更凸显了人类艺术创作的意义。“你去美术馆看大师的原作,有时会感到汗毛竖起,那是艺术家当时的情感与气息,穿越时空与你交流。AI只是工具,它没有感受,没有真正的感情融入,而好的作品,是有创作者的温度在里面的。”

在回答读者提问时,徐骥再次提到他编著《为人民造像》这本书的初衷,“我们希望‘为人民造像’不是为了说教,而是让艺术走进人民的心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骥(左)向阿来赠送自己的画作。罗一致 摄